编辑:严晓星 美编:刘玉容 校对:陈彻 组版:曹珺

史海回眸

“海门府”修缮记

□王其康

海门府”是西南营历史街区内,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处明清古建筑群,清海门直隶厅同知王宾家族在此居住近40年。1982年,此宅院以“南关帝庙巷明清住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期,“海门府”修缮竣工。

修缮后的“海门府”轿厅

技术工人正在复制“哺龙脊”

“海门府”位于南通市的南关帝庙巷内,由东西两个合院组成。两院占地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有建筑单体23个,建筑面积2430平方米。清海门直隶厅同知王宾家族,在此居住近40年。王宾三任九年,积极支持张謇实业救国,与张謇一起开发海门,创实业、办学校、修水利、建港口、兴桑田、灭蝗害。王宾去世,张謇撰书挽联、亲往吊唁,称王宾是“为官楷模”。王宾家族与邻居相处甚好,坊间雅称此宅院为“海门府”,流传至今。1982年,此宅院以“南关帝庙巷明清住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西南营历史街区内,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处明清古建筑群。

前期准备

“海门府”建筑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归为公产。长期以来,由于实际使用单位众多,安全责任主体不分明,居住、经营功能兼具,失修严重,文物价值得不到体现,部分单体已成为危房,引起了产权单位——南通市机关事务局的高度重视,因此与市文保部门一道,多次向省文保部门提出修缮申请。省文保部门派专家调研后,修缮计划得到批准,并划拨了专项资金,同时也对修缮时间提出明确要求。对此,市政府作了专门研究,召开了协调会,先将“海门府”的产权,变更为崇川区文旅公司。崇川区政府,随即成立了专项工作班子,修缮的前期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腾迁了居住户;对损坏较严重的本体,进行了先期保护性支撑;设计部门则抓紧时间,做出了设计方案,几经讨论,获省文保部门批准。这些工作,为后期修缮创造了良好的基本条件。

修缮轶事

2021年7月26日,工程队组织人员,有序进行保护性拆除清运。清理到东院时,工人们发现墙面嵌有一块石刻,于是向崇川区文保部门汇报。7月30日,崇川区文保部门邀请南通地方史专家赵鹏老师,笔者陪同,至现场勘察。石刻分为两部分。北部是一幅梅花,南部刻字乃收藏者为这个刻石而题的六首七绝诗。此石刻为道光十四年所作,主人是张金琛,字品南,号蓉舫。此石刻的发现,厘清了南关帝庙与“海门府”及原住户之间的关联,并基本确定,“海门府”院落早在道光年间就存在了。笔者曾有文记载了对石刻的初考,刊于2021年10月21日《南通日报》。

“海门府”轿厅的屋脊,原来东西各有一个吻兽,是屋脊的重要物件。因年久失修,西边屋脊吻兽仅存半截身子,头部残缺不全,而东边屋脊吻兽则完全受损。究竟此吻兽原为何样?怎么才能恢复原貌?工程队技术员,找到在外地古宅修缮时一份图纸,比对现存半截身子基本吻合,初步判断为哺鸡脊,遂在原底座基础上,做出了模型,准备予以修补。崇川区文旅局韦峰老师考察后认为,哺鸡脊虽能与原吻兽身子吻合,但从南通民居的吻兽特点看,鲜有如此形态,故持怀疑态度。正当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灵感突现。想起很久之前,在谯楼参观“城市记忆”展览现场,见过姚剑湘老师有一对哺龙脊的照片。于是找出照片,放大比对,没想到所有细节特征,竟然高度吻合。因为此宅院为王宾故居,他官至五品,故认为哺龙脊较哺鸡脊更合情合理。有幸的是,照片中这一对哺龙脊,仍收藏在南通市博物苑。而后,工程人员据此复制了哺龙脊,装上轿厅的屋脊,修旧如旧。

“海门府”修缮一年多,正是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市区两级政府人员,多次到施工现场指导。工人每天上下班进行体温检查,并严令禁止外出,封闭施工。在去年12月“新十条”公布后,正值地下工程及铺设线管工程的关键时刻,工人们“中招”不少,直接影响到施工进度。各级领导对施工方提出要求,以保护人的健康为前提,不允许为了抢工时而带病上班。施工方灵活错开班组施工,减少了交叉感染。

几朵花絮

在“海门府”修缮现场,工人们是最辛苦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2021年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节),施工现场如火如荼,工程队接到濠阳社区的通知,将于上午向师傅们开展“送温暖”活动。此时在屋面揭瓦的施工人员,大家都是灰头土脸的。工程队长让他们先停工,下来休息片刻。他们表示,身上弄得这么脏,社区来现场送八宝粥,太不尊重人了。大部分工人都是60岁左右的老匠人,淳朴的品质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马上先到宿舍,洗脸洗手,换了干净衣服,迎接社区的慰问。

2022年春节,天出奇的冷,不利于修缮工作,施工队让工人分批回乡过年,安排值班人员。于工程师自荐留下来值班。农历初三,笔者作为崇川区文物安全巡查员,巡查到“海门府”工地,几个大门都上了锁,但工地里面却有隆隆机器声,不觉心生疑惑。经过电话联系施工队,才知道是于工程师一边值班,一边自觉地在工地做粉碎土渣工作。他对笔者说:“闲也闲着,不如找点活干干。”

2022年10月,铺设地下管道工程全面开挖。设计上要求开挖的线路,宽约60厘米,深约100厘米,总长度达近千米,均离墙不远。原计划是60个晴天全部完工,想不到11月份连续下雨,而且其中几天达到大雨级别。已开膛破肚的地面,无法施工,急坏了施工方。下大雨那些天,他们就住在工地,每天日夜巡查,监测房体是否有下沉迹象。大雨过后,经仔细检查,除了有部分积水,幸好没有出现大的险情。雨停后,工人们加班加点抢进度,保证了工期准时收工。

2022年10月15日,市政府发文,以“海门府”修缮完工为契机,将南关帝庙巷与南大街的入口打开,营造宜人的节点空间,现在这一工程已竣工。

历史人物

潮桥朱氏重家学

□彭伟

潮桥朱氏,世代书香,家学深厚,以诗名世。王广业为朱霖诗集作序,赞曰:“尊甫灌园先生,绩学工诗。”光绪壬辰(1892),朱霖孙朱兆蓉与包兰瑛结为佳偶。两人婚后鸿案相庄,唱和至老。包兰瑛,字者香,又字佩棻,清末知名闺秀词人。

包兰瑛于《〈锦霞阁诗词集〉自序》中又言:“朱固儒族,太翁尤工诗,有《旷观楼集》行世。”《旷观楼集》即朱霖著《旷观楼诗存》,凡八卷,朱鼎文、朱时帆兄弟校对编印。朱霖诗才,闻名海内,屡受名家赞誉。晚清名宦、闽浙总督卞宝第,赞言:“有唐诗伯韩河阳,香山一老与颉颃,朱公继白诗其昌,雪眉梨颊寿而康,历千百祀名永藏。”下至朱敏文,朱兆蓉上三代,无不工诗。

朱氏尤重家教。朱霖自作《课孙口占》,告诫孙辈,读好书,做好人:“明经与修行,早晚好书绅。”朱时帆教子有方,包兰瑛记述:“翁训外子芙镜严,宦浙时,延师旅邸,词章之学,虽风雨寒暑不去口。”朱兆蓉幼承庭训,伏阁受读,孜孜矻矻,兼工诗文,撰有《染雪庵遗稿》。

朱家学问甚富,何啻精通诗学。朱兆蓉于《四旬自述诗》中忆道:“琴曲共修名世谱,药丸还守活人方。”前半句指朱家子弟精通琴术,朱兆蓉师承同乡云闲上人。朱时帆、朱兆蓉一起协助云闲编审《枯木禅琴谱》。朱氏还是杏林世家。朱兆蓉通医,曾经治愈镇江周笠农。朱家还爱书画。朱霖逝后,“书画碑版名世者,所藏不啻千计”。朱兆蓉勤奋学画,“精南田设色花卉”。许冠群称许朱兆蓉:“风流潇洒世无论,诗画琴棋寄此身。”

2008年春季,西泠印社上拍一方“朱兆蓉铭琴式端砚”,尚可一睹其才。铭文如下:

琴本禁邪心,雅乐岂世俗。扫室更焚香,端坐贵严肃。身动及头摇,张口与踞足。亵狎或笑谈,作势悦耳目。俗子匪知音,伎艺亦非属。风雨声不调,酩酊时则渎。乃有市井徒,计利以相淑。殷勤陈此词,学者善自勗。

光绪癸巳蒲节前一日,如皋朱兆蓉题

观其篇什,自然流畅,又涉及琴学、医学、哲学;观其小楷,滥觞于唐人颜鲁公《麻姑仙坛记》,结体宽博敦厚,笔画精练老到,气韵儒雅,清秀如绘:足见题者乃饱学之士、博才之人。

抗战故事

新四军东进后的战绩

□程太和

新四军东进后,多次抗击日伪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捷。

攻克三阳镇、进攻久隆镇

1942年元旦,新四军三旅八团在旅长陶勇指挥下围攻海门三阳镇,激战两昼夜,3日晨攻克。接着进攻久隆镇,敌300余人投降。

悦来镇外围阻击战

1942年4月10日,新四军三旅七团一、三营和海启警卫团一营在悦来镇外围阻击率部来犯的敌伪军三十二师师长徐承德部,10日晚七团发起攻击,11日晚徐承德到战壕督战时被击毙。此战歼灭伪军80余人。

进攻白蒲

1942年4月5日,新四军三旅一部进攻白蒲,歼伪三十四师特务团大部,俘伪副团长和全部伪警察。

陆家庄战斗

1942年4月12日,新四军一旅二团在叶飞司令员指挥下,对离如皋城10华里的陆家庄伪军据点发起攻击,毙伤伪官兵93人,生俘42人,打破敌限期修复如黄公路的计划。

金余伏击战

1942年6月,南通县警卫团配合海启人民的反“扫荡”,派二营在金余镇伏击从南通金沙沿运盐河去海启的伪军,打垮从盐阜调来的伪军三十一师一个团,歼敌近200人。

奔袭海门茅镇

1942年6月28日,南通县警卫团、通海自卫团协同作战,星夜奔袭海门县城茅镇,歼敌百余人。这次奔袭虽未攻克茅镇,但是创立了四分区地方武装攻入县城的首例。

石港攻坚战

1942年夏,为支援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四分区组织石港攻坚战。分区七团担任主攻,南通、东南两警卫团配合作战。8月9日凌晨至下午3时,全歼石港守敌,俘伪三十二师六十四旅一二七团副团长以下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345支,电台1部。将据点周围16个碉堡全部平毁,同时击退金沙、马塘、孙家窑、沙家庄增援之伪军。

攻击搬经等据点

1942年8月1日,新四军一旅一团、旅特务营各一部及如西县警卫团攻击如西搬经、卢港等据点,毙俘日伪军130余人,拔掉伪军在卢港新筑的据点。8月2日,新四军一旅一团又袭击水洞口据点,伪二十六师陈才福部予以沉重杀伤。

谢家渡伏击战

1942年9月24日,日军南浦旅团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中佐率日伪军200余人进犯三余镇,25日分两路北犯。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师长粟裕亲自指挥下,25日在二窝附近谢家渡设伏,午夜总攻,26日晨2时结束战斗。击毙日军保田中佐以下70余名,击伤30余名,俘虏日军3名,伪军12名。

东夏庄战斗

1942年10月19日,伪独立十一旅孔端五部600余人从蒋垛、古溪据点出动,两路袭扰抗日根据地雅周区,一路抓丁抢粮。泰县独立团在雅周区倪家庄隐蔽集结。伪军抓足抢够,准备回据点时,独立团兵分南北两路,以钳形态势向东夏庄合围而去,雅周区民兵和群众千余人配合行动。一营一连从左侧插进敌先头连后部,截住退路,二连由吴立批参谋长率领从正面进攻,干掉敌人哨兵后,冲进村庄,用轻机枪对敌扫射。刹那间,四下里一片呐喊,铜锣、爆竹、火铳齐鸣,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伪军遭此袭击,纷纷向来路逃窜,正好落入民兵的天罗地网,由于民兵开火过早,敌退路未完全切断,主力又离敌太远,只截住一部分伪军,大部分夺路逃跑。曾如清政委和吴立批参谋长带领战士追击18华里才停止。此战,共毙、伤敌伪军50余人,活捉8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小炮2门,步枪80余支,子弹2000余发,夺回被抢的粮食、畜禽、财物100多车,全部交还群众,还救下被绑架的青年农民近百名。《江潮报》连续报道这一战捷,新四军苏中军区发来嘉奖电,称之为首创苏中主力地方化的独立团与民兵协同作战的第一仗。

地名掌故

通东地名探源

□李元冲

南通东部一带地区俗称通东地区,在通东地区的地名中,“场、总、灶、甲”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地名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地名不单单代表着一处地域的方位,它的背后还有众多的史实、典故和内涵。地名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因此研究地名文化历来是方志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通东地区的“场、总、灶、甲”地名,作为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说明了通东地区的地域特征,更体现了先民们坚韧不屈、艰苦自立、开拓进取的人文性格。对于通东地区“场、总、灶、甲”的来源,在网络和报刊上,常有些文章出现,但总是各说各的,甚至有人说“灶”是古代祭祀的地方,“总”是海边新长出来的陆地;有的虽说“场、总、灶、甲”是盐文化的产物,但对“场、总、灶、甲”的解释各异。为此笔者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通东地区的制盐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时“上都流入,煮盐为业”。“场”即盐场,古代多选择靠海、卤气旺盛的滩涂来开辟盐田,称之为亭场,简称“场”。“场”与“场”之间,近者数里,远者不过二三十里。北宋时已对盐业生产实行了较为系统的国有管理。据《南通市志》引用《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北宋初期,约开宝八年(975年)前后,市境南部地区有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和余庆8场,隶属通州丰利监(治通州)”,元代时余中沙形成,土地拓展,盐产增多,官府遂将余庆场分为余西、余中、余东3场。

南宋时对盐业的管理更为具体,据《两淮盐法制》记载,淮盐产区的盐务管理实行场、灶、总、甲的管理体制。一场有10灶,一灶有盐民20余户,数户编为一甲,数甲编为一总。当然实际上“场、灶、总、甲”的编制数量并非这样死板,据《南通市志》记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市境(指南通市境内)十场实有煎灶301座”,这样平均一场就有30多灶;明代以后更是打破了这样的规定,“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通州境内12场,有煎灶1862座”,平均一场就有煎灶155座。

由于盐有丰厚的利润,所以历代对盐业的管理很严,为防止食盐走私,元代以后规定必须“聚煎”(集中在一起煎盐),于灶户聚煎之处设团,围墙垣(即围墙),所以“垣商”之说始于元代。

明代对私盐的管理更为具体,对走私者个人、收购者、运输者等共规定了32条法律,其中对走私者个人有19条法律,第一条规定是针对返卖私盐的:“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第二条规定是针对灶丁的:“凡盐场灶丁……夹带余盐出场及私煎货卖者,同私盐法(即与第一条同样对待)……”第三条规定是针对买食私盐的:“凡买食私盐者杖一百……”明代还对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实行严格的“灶籍制”管理,即与农耕居民的“民籍”完全分开,而且一旦成为“灶籍”就不得转为“民籍”而从事其他行。并规定灶籍居民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以限止洪武年间从江南“赶散”到各盐场的“王府绅民”进入仕途。

清代沿用明制,但比明代管理得更严,即实行“火伏制”,所谓“火伏制”,就是“凡灶户起火烧盐,须有灶头向灶长领牌,悬于煎舍,煎毕止火,将牌缴还灶长,灶头按灶户领牌时刻登记于簿,复按时刻赴煎舍盘查盐货”(《南通市志》)。场直接管理“总”,一场分为数总,一总分为数甲。

通过以上历朝盐业管理的情况,大体可以得出通东地区盐业管理的模式(当然历朝各个时期的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两淮运盐使司→利丰监(明、清称通州分司)→场(明代时通东有十场)→场下设“灶”(元代称团)和“总”→总下设甲。“灶”元代以后主要是对烧盐和灶墩的管理,而“总”和“甲”主要是对荡地的管理,盐民在对所分得(或租用)的荡地上收割烧盐的柴草为主,部分土地也用于农耕。

“灶”由场直接管理,各“灶”的灶墩数量是根据煎盐的需要而设置,从几十灶到几百灶不等,现在通东地区称“灶”的地名,是当年集中煎盐的地方,“灶”上的盐民称“灶丁”或“煎丁”,由他们负责盐的煎煮。“灶”设“灶长”和“灶头”,现在的“王灶”“东灶”等地名中的“王”“东”,可能是当年“灶长”(或灶头)的姓氏。

“总”也由场直接管理。两总之间东西宽约1—2里,南北间一般北起沈公堤(老皇岸),南至今老通吕公路。为便于排灌,“总”与“总”之间一般都有河道,如余东场就有“王灶河”“仇灶河”“李灶河”等。“灶”一般都设置在河道旁,这样也便于盐的运输。“总”的人数历代都不同,自宋代始,甲丁(也称“煎丁”)可以由官府分得一段草荡地,供煎盐烧草之用,为便于对甲丁的管理,如宋代一总分成约3–5甲,清代一总约10甲左右,“总”的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不等。“总”,一般以顺序编号,如“一总”“廿五总”等,“总”设“总辖”,负责“总”内之事。现在的“总”,可能是当年“总辖”的办公地方。

“甲”,是盐业管理的最基层单位。总下设“甲”。为便于排灌,“甲”与“甲”之间一般都有与河道相通的“沟”。盐民被称为“甲丁”,甲丁的人数历代都不同,如宋代一甲约3–5户,以每户约2–3个甲丁计,一甲约在10丁左右,但清代一甲约有近百人。“甲丁”不仅负责荡地草的培管和收割,还必须把收割后的荡草运送到指定地点,以供烧盐。“甲”一般也以自然顺序编号,如“头甲”“二甲”等。“甲”设“甲长”和“甲头”,负责“甲”内之事。现在的“五甲”“六甲”等地方,可能是当年“甲长”或“甲头”办公的地方。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